

# “纸灰档案”首次公开 再现日本侵占大连真实历史

本报记者 王金海



整理破译出的“纸灰档案”



“纸灰档案”发掘现场

2018年8月15日，在日本无条件投降73年之际，辽宁省大连市档案馆首次公开2006卷珍贵的“纸灰档案”，供市民查阅。这些档案清晰记载着1905年至1945年日本侵占大连40年间的历史。

大连市档案局档案编研处工作人员孔晶告诉记者，1945年8月，在大连的日本侵略者开始焚烧档案，销毁侵略罪证。然而，这些没燃尽的档案发生炭化反应后竟然保留了下来。从上世纪80年代起，大连市档案馆研究人员开始研究破译这些“纸灰档案”的内容，日本侵略者在大连的累累罪行从此昭示天下。

## “纸灰档案”重见天日

于成福是大连市档案馆档案资料征集处处长，多年来潜心研究“纸灰档案”，撰写发表过多篇论文。他向记者介绍，1964年11月，谭守昆、吴忠仁等7名大连工人在旅大市公安局北门处挖树坑，此地是日本统治时期日本大连警察部所在地，突然他们挖出大量黑色炭状物，状似纸张、书籍焚烧后的纸灰，却又能完整托起，不像普通纸灰那样一接触就破碎。阳光斜照在工人们手中的纸灰上，大家猛然发现，纸灰上面还有字，仔细辨认是日本文字。

考虑到这里在日本殖民统治期间是日本警察的办公地，这些日文资料一定非同寻常，在场人员立即向旅大市公安局报告。公安人员赶到现场，小心地将所发现的纸灰全部挖出来带走。经过初步整理鉴定，旅大市公安局确认这些纸灰是日军撤离大连前对档案进行销毁处理的残存物。从此，“纸灰档案”的叫法开始流传起来。

据悉，1945年8月15日到8月22日，在大连的日军被解除武装投降期间，日本大连宪兵队、关东州厅、警察部、刑务所等警、宪、特机关大量销毁罪证，焚烧了文书档案、技术图纸、经济账目、特工人员名单等众多档案资料。大连沙河口日本警察署长江见俊男将特工人员名册全部化为灰烬，大连广场日本警察署上村八藏则在警察署后院将各种文书档案全部烧掉。

据知情人回忆，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的广播刚一播出，日军很快就将一批记录日本在旅顺刑务所犯下滔天罪行的档案资料集中烧毁，焚烧行动一直持续3天。日本战犯、原旅顺刑务所长田子仁郎在1955年的审讯供词中交代，原旅顺刑务所的档案是在他的指挥下烧毁的，“只有收容者身份账留了下来”。

当年的日本侵略者怎么也没有想到，他们极力想销毁的罪行记录会变成“纸灰档案”保留下来，又被大连人民挖掘出来。1964年11月7日之后，大连一些施工工

地又陆续挖掘出“纸灰档案”。这些“纸灰档案”，既是对日本侵略罪行的揭露，也是侵略者毁灭灭证的历史证据。

这些被焚烧的档案为何会成为“纸灰”呢？于成福认为，这是因为日本侵略者做贼心虚、行动仓促造成的。当时的日本侵略者不敢在白天焚烧档案，只能在晚上偷偷进行。他们把档案投入挖开的沟中点燃，又在这些文件、资料尚未燃尽时便匆匆填埋。结果表层的档案烧毁了，下面的档案没有充分燃烧，这些由草木纤维构成的纸张在缺氧条件下处于完全炭化或半炭化状态，在泥土的常年掩盖下保存了下来。“纸灰档案”的形成与烧炭的原理相似。

## 多年攻关还原档案

由于这些档案怕风化，易破碎，无法翻阅，且不易保存和复制，当年公安部门受条件所限，只能对其加以整理、编目保存。上世纪80年代初，公安部门将这些档案移交给刚刚成立的大连市档案馆，大连市档案馆将这批档案正式命名为“纸灰档案”。

如何让“纸灰档案”恢复原貌？大连市档案馆成立了专门技术部门，启动对“纸灰档案”的复原和破解工作，于成福就是当时技术攻关组的成员之一。于成福说：“当时既没有现成的技术可借鉴，又没有先进的工具用来操作，复原‘纸灰档案’的难度可想而知，其过程漫长而艰难。”他们曾把炭化的档案剥离后进行托裱，但剥离过程中炭化的纸张很容易破碎。他们曾决定手工抄写档案，但抄写不能保持原件的特征，且易出差错。他们也曾用普通拍照、红外摄影、红外扫描等办法进行恢复，但都没有成功。历时数载，经过反复尝试，大连市档案馆专门研究技术人员选择运用特殊的照相翻拍技术，终于打开了还原“纸灰档案”的大门。

他们先采取特殊的裱糊技术，将“纸灰档案”进行拼接、托裱；然后利用其纸面与字迹的笔痕在强光照射下形成的明暗反差，进行翻拍、复制；随后，用低感光度色盲片进行翻拍，将照片高反差洗印；最后，用复印机放大复印成纸件，装订保存。如此操作，共需十几道工序，一页“纸灰档案”的复制需要2天左右，最终保证了复印件的内容、笔迹与原件完全一致。

“这些技术流程，如今说起来不免枯燥，而当初无论是‘纸灰档案’的加固、翻拍条件的选择，还是显影过程的控制，都需要精确到极致，如同走钢丝般小心翼翼。馆藏‘纸灰档案’就是这么被复制下来、成功抢救的。”于成福不无感慨地说。

## 记录日军侵略罪行

记者查阅2006卷“纸灰档案”发现，大部分是1905年至1945年日本侵占大连期间，日本大连宪兵队、关东州厅、警察部及各警察署等殖民统治机关的档案，主要反映日本警、宪、特机关日常工作、训练及其对当时中共大连地方组织秘密开展调查的记录。

“日本侵略者利用这些庞大的警、宪、特机关残酷迫害旅大乃至东北地区的中国人，同时对于建立不久的中共大连地方组织，不断采取公开与秘密搜查、大肆逮捕、严刑拷打等各种手段疯狂镇压，中共大连地方组织多次遭到毁灭性打击和破坏。”孔晶说。

“纸灰档案”中，“查缴放火团”的记载屡次出现。“放火团”又称“抗日放火团”，是以大连工人为主体的以破坏日本在华占领区的军事设施和烧毁日军战略物资为目标的国际反法西斯组织，其活动中心在大连，姬守先、黄振中等中共党员是该组织的骨干。据日军档案中的统计，1935年到1940年间，“抗日放火团”在大连秘密实施放火57次，给日军造成了多达3000万日元损失，这些钱足够日本关东军两个师团一年的军费开支。这令饱受日本殖民统治之痛的大连人民欢欣鼓舞，也令日本侵略者惊慌失措、大为震怒。

“抗日放火团”组织严密，训练有素，讲究方法，采用化学燃烧装置放火。大火在燃烧装置启动许久后才燃起，现场不留一点痕迹，与自然火灾无异。日本特务们每天“不眠不休”地进行侦查，仍然毫无成效。一个参与侦查“放火团”事件的日本警官曾如实记载：“纵火事件经常发生，为此而头痛的关东局长总长犬津（曾担任过日本警视厅刑事部长）经常催促着：‘抓到犯人了吗？’可是再怎么严厉训斥警察也不顶用，因此他十分着急。”

“抗日放火团”活动是大连近代史上影响最大的抗日斗争事件。为追查“抗日放火团”，日本侵略者在5年时间里动用3000余人，警、宪、特三位一体共同调查，野蛮残害大连工人。据相关档案等资料统计，日本警、宪、特迫害有涉案嫌疑的大连工人达百万人次，其中盘查虐待60万余人次，拘留、拷问、审讯10万余人次，致死致残万余人，判刑下狱近百人。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日军在大连进行殖民统治的绝大部分档案都被带回日本国内或就地销毁，留存下来的档案少之又少。大连“纸灰档案”的发掘和还原，为了解和研究日本侵占大连40年历史提供了大量丰富的、有价值的资料，让日本侵华的桩桩铁证重现于世人的视野中。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考古队介绍，河南殷墟大司空东地考古取得重要收获，发掘商代晚期1个无字甲骨坑、多条道路、1座带一条墓道的大墓、3座车马坑等重要遗迹。

新发现的无字甲骨坑出土甲骨165片，这是殷墟在小屯宫阙区之外发现无字甲骨最多的一次。

新发现的甲骨坑是袋状坑，口径1.8米，底径2.4米，深1.6米。出土甲骨基本无字，主要是牛的肩胛骨，还有少量龟甲。

## 殷墟新发现无字甲骨坑 属商代晚期贵族所用

□桂娟



安阳无字甲骨坑H279 来源：中国文物报

甲骨学家认为，这次发现很重要，属商代晚期供贵族使用的甲骨，与小屯所出的供商王使用的甲骨有一定的差别，表明供商王使用的甲骨整治和占卜手法更加娴熟。此次发现的牛肩胛骨四角被截锯的片数较多，从卜兆看，龟甲上的跟小屯所出的一样规整，牛肩胛骨上的普遍不及小屯所出的规整。

大司空东地位于殷墟遗址东北部，向西500米与小屯村宫阙区隔河相望。为配合安阳市民生保障工程，经向国家文物局申报，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安阳考古队在大司空东地的两个地点作了考古发掘。

此次揭露出的多条道路，进一步完善了殷墟洹河以北地带的道路网络。结合以往考古成果，可知殷墟道路有3种不同宽度，有的宽10米以上，有的宽约7米左右，较窄的宽3-4米，或许对应后代城市的干道、街、巷。

据专家介绍，殷墟布局具有大聚合、小分散的特点。本次发掘，为研究殷墟洹河以北地带的聚邑内部结构提供了新的场景。

此次发现的1座带一条墓道的大墓，形制较特殊，为研究商代墓葬制度提供了新资料。在大墓墓道边发现的年代早于大墓的2座车马坑，已搬迁到异地准备做精细考古清理。

## ◎匠心

### 嘉定竹刻： 琴心剑胆竹上书

□王锦强 覃奕



张伟忠竹刻《薄地阳文青青翠竹尽是法身臂膀》

竹，在人们心中是高雅、纯洁、有气节的精神文化象征。古往今来，人们习惯用“人生贵有胸中竹”来形容自信、有涵养的谦谦君子。竹对中国文人雅士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他们赏竹、吟竹、用竹，以竹为榻，以竹为笔，以竹为友，以竹自喻，东坡居士曰：“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竹节有凌云傲骨，竹根则质朴无华。竹根埋于土里，如同自然著就的天书，待人循其形质，条分缕析。南方为产竹盛地，历代竹雕大师多出于江南，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嘉定”与“金陵”两大流派。

“明代正德、嘉靖年间，朱鹤将书画艺术融入竹刻，开创了以深刻透雕为主要技法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嘉定派竹刻。”嘉定竹刻博物馆的导言这样描述“嘉定派”竹刻起源，并称赞嘉定派在最为兴盛的清代康熙至乾隆年间，竹艺人作品达到了“及物之体、尽物之神、得物之趣”的境界。优秀的嘉定竹刻创作者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精通诗、书、画，具有全面而深厚的文艺素养；二是心胸洒脱，高蹈出尘，不染世间俗气。许多文人士也加入到嘉定竹刻的创作中来，如清代的金石家瞿中溶、画家程庭鹭等，从而为嘉定竹刻染染不同于职业艺人的别样风貌。时至今日，嘉定竹刻的创作群体早已超越江南一隅，而优秀的传承者在深入研习传统技艺的基础上，开始表达自己对竹刻的理解、对艺术的体认、对时空的感悟。

生于上海嘉定的张伟忠专事竹刻研究及创作长达30年，他的《圆雕如意》取妙吉祥之意，源自佛门法器。如意既是一种传统器物样式，也是一种本身体性状态，外求形，内取意。竹如意，人如意，竹人如意，人人如意；人如竹，竹如人，个个如意，节节如意。在另一件作品《薄地阳文青青翠竹尽是法身臂膀》中，张伟忠以十八罗汉之禅杖罗汉为题材，人间百态化作罗汉相。充分尊重和发挥竹材固有的审美特性，因材赋形，因形造境，注重线面与内在关系以及空间的相互渗透。人物边缘的处理虚实相生，隐约空灵。

## ◎家风家训

### 台山叶氏：崇教尚俭，乐善好施

□谷敏 廖博雅

广东台山，被誉为中国第一侨乡。据不完全统计，祖籍台山的侨民目前全球约有130万人，比今天台山市的总人口还多。台山侨民不仅通过自己的勤劳智慧在海外立足，也为中国与海外各国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密切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其中，加拿大的叶连生家族就是这样一个知名的华人家族。

叶连生（1845-1927），字来饶，又字春田，英文名为Yip Sang，加拿大著名侨民领袖，广东台山人。叶连生幼年十分不幸，父母早逝，姐姐又被盗匪掳去而失踪。迫于生计，叶连生不得不早早辍学求生。1864年，叶连生还不到20岁，就远渡重洋前往美国洛杉矶。他在雪茄厂工作过，又做过厨师，能吃苦且极富生意头脑。

19世纪80年代，为开发西部地区，加拿大政府决定修筑太平洋铁路。从1880年6月到1887年7月，加拿大一共招募了华工约2.5万人。就在1880年前后，叶连生成为加拿大太平洋铁路承建商、美国人安德东克的助手，在温哥华成立了永生公司，负责招募华工。众所周知，华工为加拿大这条横贯东西的大动脉做出了巨大贡献，也付出了极大代价，数以千计的华工再也没有机会回到家乡，永远沉睡在异邦。

有感于华工的不易，太平洋铁路建成之后，叶连生积极支持华工成立中华会馆，以便有困难可以互相帮助，建立侨民医院，方便侨民看病就医。他还自己出资送一批希望返乡的华工回到家乡。叶连生发现，一些侨民子弟因为家贫而无法读书，便创立了具有慈善性质的“爱国学堂”，并亲自担任校长，“成就学生甚众”。同

时，他也在国内广行慈善，对台山中学、岭南学校、广东公立医院等教育医疗机构予以资助。在孙中山先生创立同盟会时，叶连生也给予了积极的支持，并鼓励自己的儿子叶求钦加入同盟会。

家庭教育方面，叶连生督促家人甚严。一是尚节俭。他时常教育子女：“圣人以节俭教人，乃保泰持盈之道。家由是而兴，国由是而强。然俭又非吝啬之谓也，去其奢泰（过度消费）而已。”

二是重视学习。叶连生自幼失学为憾，对家人的教育十分重视。他自己以身作则，年逾五十开始系统学习英语，“中夜废寝，竟通其学”。他曾勉励家人说，像我这样早已过了学习年龄，尚且能把英语学好，你们都还年轻，更加不要妄自菲薄。

三是注重家庭关系。他常教育家人要团结一心，相互谅解，他说，兄弟姊妹要“相亲相爱相让，不可斗气，更不可构讼，凡讼必空，汝等慎之，慎之。凡事要通融办理，不可过急，此乃余最注意也”。

叶连生子女众多，其中不少也秉承了叶连生重视教育、乐善好施、热心社会事务的美德。其子叶求锦，毕业于加拿大皇后大学医学院。他看到不少初到加拿大的华人因不习惯西医而延误治疗时机，就尝试对华人进行中西医结合治疗，使他们能够得到及时救治。他在唐人街的诊所每周设有免费诊疗日，帮助那些无钱看病的华人。

叶求锦之弟叶求均，自中学起就热爱足球，他克服重重困难组建了一支华人足球队，屡获佳绩，在1933年加拿大不列颠省的“大陆杯”比赛中甚至击败了加拿大

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校队。加拿大媒体争相报道此事，海外华人也为之欢呼雀跃。1998年，叶求均入选加拿大不列颠省“体育名人堂”。

叶求锦的另外一个弟弟叶求铎，是加拿大第一位华裔律师。他在1947年加拿大废除带有歧视性的“排华法案”事件中，成为华人请愿团队的主要成员，为法案的废止发挥了重要作用。

今天，当我们漫步在温哥华的唐人街，可以看到一座醒目的砖石结构建筑，它就是1889年由叶连生一手创办的永生公司。永生公司是温哥华唐人街现存最古老的建筑之一，已于1999年获得温哥华市“历史文化遗产”称号。它不仅为加拿大作为多元文化国家的历史见证，更是海外华人艰难创业的珍贵遗迹。



永生公司建筑

谷敏摄